第39卷 第2期　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Vol. 39，No. 2
2025年3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Mar. 2025

DOI：10.16339/j.cnki.hdxbskb.2025.02.010

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研究路径*

王佳宇，赵亚茹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后人文主义修辞学质疑将人类视作唯一的修辞主体，主张将技术、人造物品、动植物等生命物，以及非生命自然物的修辞能动性纳入研究视域。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及中国社会和语言生活实践，结合后人文修辞学探讨了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四种研究路径。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国当代政治理念及后人文主义核心概念，重构人类与非人类要素共构的修辞集合，旨在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后人文主义修辞理论体系，为应对技术革新、生态危机与全球话语权重构提供学术支撑。

［关键词］后人文主义；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技术修辞；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25)02-0087-09

The Research Paths of Chinese Posthumanist Rhetoric

WANG Jiayu，ZHAO Yar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Posthumanist rhetoric challenges the view of human as the sole rhetorical subject and advocates the inclusion of the rhetorical agency of technology，artifacts，living beings such as plants and animals，as well as non-living natural objects into the research scope. This paper explores four research paths of Chinese posthumanist rhetoric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Chinese social and linguistic practices，and posthumanist rhetoric. Chinese posthumanist rhetoric integrates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concepts，and core concepts of posthumanism to reconstruct the rhetorical assemblage co-constructed by human and non-human elements. The aim is to establish a posthumanist rhetoric theory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so as to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for responding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ecological crisis，and global discourse power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posthumanism；Chinese posthumanism；rhetoric；technological rhetoric；research paths of posthumanist rhetoric

一　引　言

我国修辞学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对书面文字、修辞格及文体风格等的考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多模态视角进行修辞研究，探索动作、服饰、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的修辞意义。冯德正等将修辞结构理论应用于静态与动态多模态语篇分析，考察了在数字媒体时代，图像、文字等模态如何相互关联，建构多模态语篇[1]。黄立鹤更为直观地提出了“人类行为本质上是多模态的”，认为修辞主体是通过调用多种模态资源来实施修辞，且强调“将修辞视为人类的一种行为”[2]。顾曰国则进一步主张将人体的感官模态融入修辞学研究，提出“修辞即做人”，即修辞立论的基点是鲜活的、通人情世故的、多模态的、多符号的和多感官的“整人”，而非抽象的

* ［收稿日期］2024－07－18
［作者简介］王佳宇（1984—），男，山西晋中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

"理性人"[3-4]。

上述研究为我国修辞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它们主要聚焦于人类的修辞活动,尚未系统地探讨人类和非人类要素共构的修辞实践集合及其中非人类元素的修辞能动性。与此同时,国际修辞学界正积极地将修辞学的研究范畴拓展至人类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之外,将技术、动植物以及人造物等非人类元素纳入考量,考察它们在修辞过程中的参与和影响。这种研究态势被称为后人文主义修辞学。它挑战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观念,重视修辞的物质、情感和数字维度,将修辞视为一种动态的和生态的现象学,并强调沟通的不可预测和非线性特性[5]。

基于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研究关切,本文对国内多模态修辞学研究提出反思。如果按照多模态修辞学的观点,声音、图符、物件等模态资源能够实现修辞行为的话,那么修辞就不能仅视作是人类的产物。换言之,一些非人类元素在修辞实践中也发挥着一定程度上的能动性。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将修辞视作人类独有的观点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本文借鉴顾曰国将修辞学研究定位为"研究自然人是如何做人"的观点,因为"这样的修辞是人人的修辞,而不是君子、作家等所独有"[4]。这一主张将修辞回归人类的自然属性,并将修辞主体去阶级化,与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立场殊途同归。但是,顾曰国提及的"整人"概念中所蕴含的"言思情貌整一"[3]和"身脑心整一"[4]的内涵,仍有待进一步深入考究和拓展。Stormer曾通过"假体"(即借由技术和物对人体元素的延伸、修改或替代)思维论证了在修辞运作中,人类可能仅是众多元素之一[6]。因而,修辞不仅仅局限于"完整"人类可能的能力。有鉴于此,多模态修辞研究中"整人"的概念需借助后人文主义的相关理念进行进一步厘清、拓展和阐释。将后人文主义视角引入修辞学,并非意在与上述研究观点形成对抗,也非试图抹去传统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的已有成就,而是以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态度看待修辞,以期拓宽修辞学的研究视野。

二 修辞学的后人文主义转向

20世纪末以来,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流行病毒等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严峻挑战,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的飞速发展塑造着人类与物质世界相处的新形态。这些新挑战和新变化迫使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被视作无生命物或非人生物的能动性,并定义人与周遭物质环境的关系[7]。在此背景下,后人文主义思潮发端,它"试图从内部消解人与机器、动物、环境之间的二元对立,并与之形成某种富有创新性的共生关系"[8]。后人文主义相继被应用于文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批评实践,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并"承载起科技实践的文化生产以及哲学探索的现实关怀的双重使命"[9]。

后人文主义思潮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体现为对"前"人文主义的继承、反思和发展。后人文主义修辞学在关注和继承修辞学作为"研究人类符号使用的学科"的同时,也对传统修辞学中过于强调人类在修辞实践中的主导与中心地位进行了反思。例如,Davis和Ballif对以人为中心的修辞学传统进行了批评,指出"它(修辞学)将一个了解自己(传统上是男性)、他的观众以及他的交流意图的知情主体置于修辞情境的中心"[10]。后人文主义修辞学则主张重新评估人类的构成要素及人与非人的(内外)边界。在此框架下,后人文主义修辞学将修辞视作是理解和阐述人与非人要素构成的集合在互动中传情达意、影响互动目标的潜能。它不仅关注人类或人为符号,还关注其他传统上边界或定义模糊的、非符号的实体(如人工智能)在情境和言语行为构建中的能动性。

后人文主义修辞学强调技术对交流的影响。例如,Henry探究了技术写作在组织绩效中的修辞功能[11];Lucia等探讨了图像识别应用程序Google Lens的文本如何通过定位媒体和现实增强技术对复杂的人—空间—物的关系进行还原,从而实现技术修辞[12]。在理论建设层面,Brooke通过重新审视修辞学经典关于"辩证"(dialectic)理念的论述,将技术视为动态和辩证的元素,并运用超文本性和修辞生态等概念,探讨了数字媒体是如何改变人类传播实践并颠覆已有规范的[13]。Boyle进一步认为所有活动都是以物为媒介的具身活动。他指出,当今信息传播技术挑战了人类关于身体和狭义上的人类认知的内向式探究和传播实践[14]。身体的内外边界日益模糊,人的身体借由数字传媒得以延伸。(技术)修辞由此不再仅仅依赖于个人或(人类)群体的自由意志、自我身份、群体意识和批判能力,因为在应对更广泛的传媒生态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传播观的解释力明显不足。其实,国内已经关注到人工智能对修辞和认知的影响[15-17],但这些研究有待基于对传统人为中心技术哲学的反思进行技术修辞理

论的全新建构。后人文主义视角的引入有助于从哲学层面深入对修辞、技术与认知之间关系的理解，填补研究空白。

后人文主义同时关注生态环境中非人物种的修辞能动性。Rosenfeld 认为，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以全新和包容的眼光审视物种间和物种内部的差异[18]。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主张，作为具有神经反应的生命体，动物与人类一样，具备符号行为能力[19]。生物学的研究也表明，一些物种的行为，如雄性园丁鸟通过调整巢穴的布局、装饰、形状等以适应雌性园丁鸟的偏好，满足了视觉修辞的象征性质、文化偏好和传达价值等三个标准[20]。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他物种的(视觉)修辞能力。就修辞学而言，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非人类生物(如鸟类等)所特有的视觉修辞应植根于一种具有多元性差异的新唯物主义本体论，尽管它还没有被看作传统意义上的“语言”，但至少是一种与人类对自身视觉修辞的阐释共同存在的沟通形式。正如 Rosenfeld 所述，否认其他物种的修辞能力意味着非人类动物仅是基于自然生物属性做出繁殖选择的物种，而这与实际科学观察并不相符；同样，否认我们的动物性也是直接切断了我们与周遭世界的生态和物质联系，似乎人类是跳跃式进化的物种[18]。生命符号学(biosemantics)认为符号与符号、生命与生命之间交织构成了整体性的符号网络与生命网络，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s)承认生命与符号过程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并强调人类作为符号主体应对环境及他者承担伦理责任[19]。因此，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动物转向，实际上是在生物学、生命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的基础上，在修辞的范畴中促使我们进一步审视那些自人类文明早期就被固化了的物种差异的标准(如语言能力、工具使用等)，关注动物的潜在主体性、人类与动物的共存、脆弱的物种边界、他者化的动物乃至动物化的他者。

再者，后人文主义修辞学也关注人文学科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这与多模态修辞学、多模态语用学等批判“理性人假设”，强调个体主观情感(emotions)、社会情绪(sentiment)和感情规则(feeling rules)的融入看似相同。而实质上，后人文主义修辞学更关注“情动”(affect)这一更具双重时间性与物质性的广义上的情感研究概念。情感转向涉及关于“情感”的学术论辩。学界对“情感”的定义众说纷纭，包括 feeling(感情)、emotion(情感)和 affect(情动)的多种概念及区分。然而，这些核心概念缺乏稳固的定义，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呈现出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且经常交替使用[21]。本文所讨论的“情动”概念，主要基于社会语言学家 Wee 和 Goh 对“情感”(emotion)与“情动”(affect)的区分[22-23]，以及后人文主义学者 Vermeulen 对“后人文情感”(posthuman affect)的定义[24]。具体而言，情感是一种“被拥有并被认知”的主观内容，而情动则是一种跨越个人感受和经验的非个人动态范畴。人文主义及其严格编码的主观情感以人为载体，即人类为感知主体：“人”存则“情”存、“人”灭则“情”无；“情”由人而感且有多阶编码(如宽慰、开心到狂喜)；非人类生物或非生物必须借由拟人或移情等手法获得情感修辞属性。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情感转向则将传统的情感解构为难以被捕捉、定义和理解，且非主观并具身的二阶情感(second-order feelings)，即后人文情感[24]。这些情感具有双重的时间性和物质性：一方面，它们是继承了人文主义的“后人类”的产物，如物赋予人的感官或认知延伸(如虚拟现实)，以及官能增强(如脑机接口使得盲人“可视”)带来的(“人＋物”集合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后人文情感有新唯物主义或活的唯物主义(vital materialism)的环境性和物性特质，即情感借由惯习(habitus)、格式塔(schemata)、情感规则等存在于由物和其他非人实体构成的周遭环境中。换言之，环境(如烈士陵园)生成和框定了特定情感，即使人不在场，“情感权力体”(affective regime)也仍然在场。情感权力体是一系列支配条件，控制了特定场所中情动的展现方式。虽然它与感情规则(feeling rules)和展示规则(display rules)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显著差异。感情规则和展示规则通过明确规定个体应感受到的特定情感以及该情感应如何表达来运作，而情动权力体则作用于特定场所或空间、物、人类主体或三者共存的集合体，涵盖了更广泛的现象[25]。在关于情动的实证研究中，一些学者虽未明确使用“后人文主义”一词，但已开始对非人类元素中蕴含的情感权力体进行探讨。例如，Wee 和 Goh 分析了符号景观在塑造情感反应和互动中的关键作用[23]；Wang 和 Li 探讨了唢呐这一声音景观在中国媒介中的情感表征[25]。这些研究为深入探讨后人文主义情感修辞奠定了基础。

最后，后人文主义推动我们考虑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它强调将政治文化实践从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北方霸权中解放出来，重新审

视那些为维护霸权意识形态而保留下来的政策、组织(如北约)、物体(如雕像)、符号景观等。Clary-Lemon 和 Grant 明确表示,“我们的修辞与写作研究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以真实、道德、人道和审慎的方式确定本体论世界的定位”[26]2。人类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会影响每个人和每件事,因为在物质和伦理层面,我们彼此相互联系[27]。因此,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任务不是在各领域之间寻找类比,也不是吸纳或照搬去中心化理论和实践,并将其移植到后人文主义的术语之中[26]。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前瞻性在于其对人、生命物和非生命物的认知和表征中长期存在的中心—边缘(政治)关系的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多元要素和多元网络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论视界。换言之,后人文主义将人和物的关系纳入政治修辞维度,如考察最近流行的关于国宝流失海外的《逃出大英博物馆》如何以人喻物建构国家修辞,再如探究(人和)动物的级别观如何借由文学影视作品(特别是西方主流影视作品,如好莱坞英雄电影等)或网络游戏等建构殖民主义或霸权主义。

综上所述,后人文主义修辞学发端于各要素的交汇,包括新质生产力和技术进步、修辞能动性向非人类实体的扩展,以及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伦理的重新评估。它整合了物、技术、生态系统以及其他非人类有机或无机元素,承认它们在修辞过程中的主体性,将能动性归属于分布式、网络化的集合,重视各种实体修辞能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　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理论基础

(一)修辞学的多模态属性

多模态指的是通过多种感官(如视觉、听觉、触觉等)或多种媒介(文字、图像、声音等)来传递信息或表达思想的方式。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是人们用来交流的书面或口头符号。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入、通信技术发展、新媒体崛起等背景下,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多模态语言实践,涌现出众多新概念和新方法,例如语言和符号景观的空间化、社会互动多模态话语研究、都市语言实践、多元语言实践、超语实践等。这些方法不仅将语言视作多模态建构中的一种符号资源,还认为其具有物质性和空间性,因而语言本身具有多模态属性[28]。它不再是一种与其他模态资源有明确界限、静态的、固定的书面或口头资源,而是嵌入或表征社会活动、地点或空间、物体和气味的符号集合。这种基于多模态实践的语言观有利于对语言进行整体分析,了解人、符号资源和物体的不同轨迹如何在特定时刻和地点交汇、交织、共生并互动[29]。

目前,多模态修辞学主要关注人类与外部环境的交际互动,而后人文主义修辞学则主张将研究范畴拓展至涵盖动植物、技术、人造物品等生命物和非生命自然物的修辞实践。当前的社会语言学界已经将语言视作一种语言实践(languaging),认为语言的本体囊括多种模态、符号、感官资源,甚至包括物、空间、技术等的集合[28]。换言之,语言的本体就蕴含多模态、多感官、多元实践主体,如口语中蕴含了语音、语调、音量等;书面语中有字体大小、颜色等;社交网络语言本身就有跨时空性;音乐类电视节目的歌词语言本身经过技术增强来实现声音美化等。有鉴于此,对语言的研究也不能按照传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思路,将文字—多模态分而视之,进行分割—组合式的分析,而长久以来基于传统语言观的修辞学也应积极向多模态实践修辞观拓展。在后人文主义的视角下,本文重新定义了多模态修辞学的研究范畴,探究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元素的修辞主体通过嵌入在多感官或多媒介的符号集合和多元实践主体中进行的修辞实践。这种基于多模态实践的修辞观有助于我们深入挖掘修辞的本质,并理解其作为更广泛的符号学实践甚至是新唯物主义视角的一部分。

(二)后人文主义与中国后人文主义

后人文主义兴起于西方,主要源自对西方主体—客体二元论哲学的批判与反思。作为一个涵盖性术语,后人文主义涉及的理论方法众多,但其中最核心的概念有三个,即“集合”“纠缠”和“分布式能动性”。集合是实践和事物的偶然组合,与其他组合的区别在于“选择、组织、分层”上的不同[30]406。集合具有组织和秩序,且这种组织和秩序是动态变化的,因此集合的概念能够结合静止与变化的特质来理解事物的属性。集合中的实体相互纠缠,区别于独立实体之间的关联,因为纠缠意味着缺乏独立和自足的存在[31]。通过观察集合及其元素的纠缠,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元素如何围绕着一个话语聚集而发挥能动性。这种分布式能动性从本体论层面模糊了无机和有机、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边界,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的“特权”,为重新定义人类与周遭物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学理依据[7]。值得注意的是,后人文主义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而是“一个动态的概

念和活跃的理论集合体”[32]21。尽管其理论基础目前主要源自西方哲学和社会学的理念与领域，但后人文主义的开放性、动态性和包容性为中国哲学文化融入后人文主义理念提供了契机，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后人文主义知识理论体系创造了可能性。

实质上，在后人文主义诞生之前，学者们已经围绕“中国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进行了本土化的深入探索。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启蒙思潮首倡人文主义，奠定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传统。1932 年，林语堂以儒家“中庸”为核心提出的“中国人文主义”概念，启发了学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新解读。尽管“人文主义”发源于西方语境，但它逐渐成为解读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重要理论来源[33]。人文主义基于“同命运、共患难”的“全体感”，将人类视为相对独立于自然和神灵等超验力量的整体，而这种“全体感”也成为中西人文主义比较的共同基础。然而，不同的历史背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中西人文主义在时代性和民族性上的显著差异，进一步凸显了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因此，构建现代中国人文主义既不能简单回归传统，也不能全盘西化，必须走一条综合创新之路[34]。同样地，基于“全体感”这一理念，面对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全球性新挑战和新变化，“中国后人文主义”与“后人文主义”的关系也表现出共通性和差异性。在构建中国后人文主义时，同样需要走一条综合创新之路。

中国多元同和的哲学文化体系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脉络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后人文主义进入中国和其他国家各个学科领域，我们应积极借鉴其思想精髓，并结合中国语境对其进行本土化构建，形成中国的后人文主义理论。尽管后人文主义的相关概念并未在中国哲学中直接表述，但其核心内涵早已在诸多哲学流派中有所探讨，尤其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性观、人体观和生态观三个方面。在对人性问题的理解上，刘悦笛认为，儒家哲学能够应对当前后人文主义思潮的挑战，因其本身就是“后”人文的。他通过梳理相关理论指出，在人性问题上儒家并不仅局限于人文主义，而是在人性的自然根据与后天濡化之间“执两用中”，化解了当今西方学界形成的基于人的生物根基的“自然主义”与后天养成的“培育主义”的二元对立[35]。在对人体的认识上，根植于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中医学认为，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整体，并通过精、神、气、血、津液的作用维持人体的功能活动。这一人体观与 Deleuze 和 Guattari 将人体视作由有机和无机生命形式组成的机器（集合）的观点相通，他们认为，机器的本质在于其能够对持续不断的物质流进行切割和中断，从而形成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模式[36]。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人体可以被视为一个复杂的“机器”，其中气、血、津液等物质在经络等通道中不断流动，就像机器中的物质流一样；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如针灸、草药等，就像是对这些物质流进行调节和切割的手段，以恢复身体的平衡和健康[37]。在生态哲学观和生态伦理观上，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儒家“和合共生、以仁与物”的生态理念，都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的紧密依存关系，以及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纠缠。这些观念不仅涉及物质层面，如集合中实体之间的相互纠缠以及非人类元素的能动性，还包含了社会价值取向，如人类作为能动元素所应秉持的和谐、道德和责任等。中国哲学重视人的能动性，却并不将其视为唯一主导力量。《老子》中有云“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将道、天、地、人并列为宇宙间的四大力量，认为人依循地（环境），地依循天（时空），天依循道（规律），道依循自然（本原）[38]112−113。《老子》还强调“道生之，德畜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主张道（自然要素）受尊崇，德（人的要素）受重视的理想境界，是因道滋生万物而不干涉，抚育万物而不自恃有功[38]223−226。在生态伦理方面，《论语》强调“钓而不纲，弋不射宿”[39]141，认为自然界中有其生存繁衍的规则，倡导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顺应规则。同时，《论语》还提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39]167，以断绝自私、自利、固执和自我的人类（主观性情感）行为。这些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都体现了非人为中心、人—物集合纠缠、人的主观情感规约等后人文主义哲理。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的生态伦理在某些方面与后人文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甚至本身就是后人文的，因此建构中国（传统）哲学视角的后人文主义具有可行性。

当代中国的后人文主义理念也高度凝练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观之中，充分体现在“命运共同体”和“新质生产力”等概念中。命运共同体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后人文思想精髓，同时也顺应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包含了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和合共生的处世之道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等丰富的后人文理念[40]。新质生产力理念的提出赋予技术要素在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更重要的地位。后人文

主义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阐释和理念支撑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针对“何为新质”之问。“新质”意味着我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生产力要素，后人文主义对技术要素的重新审视为之提供了全新的阐释。后人文主义认为，技术、机器等是对人类认知、官能等的延伸和增强。正如 Haraway 在其《赛博格宣言》中所言，人类越来越成为赛博格，人类与人类社会以及技术的内外边界日益模糊[41]。其次是阐释“新质何为”之问。人工智能等技术要素的发展改变了对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定义。新的生产力要素如数据、算力、脑机智能、量子通信、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构人类—非人实体的关系，人与机器、数据、技术、生态环境形成了新的共同体，在前所未有的交融中形成集合，以集合的能动性形成生产力。此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观借鉴“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理念，秉持“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价值，将人类社会关注的重心从人类自身发展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的现代化的政治迷思[40]。后人文主义秉持全新的生态伦理观，解殖民主义、反西方中心论和北方霸权的批判性世界观，以及前文所述的全新的人—非人交叉性政治观，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阐释，建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理念的中国后人文主义。

总之，后人文主义的使命在于调动各种思想和精神资源，以更为周密的方式思考人类、自然、物与现代技术，以全新的世界观理解当代社会与生活的构成[42]。不同于西方后人文主义诞生于对二元论哲学的反思，中国哲学自古便蕴含着丰富的后人文主义理念，植根于此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也具有更为丰富的价值观内涵和强烈的时代和实践导向。因此，将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中的后人文主义理念与西方后人文理念融通互补，可以在理论层面上更加全面地指导后人文主义相关研究，并在实践层面为应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挑战提供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

四　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路径及展望

基于后人文主义多模态实践的语言—修辞观，并将融通了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后人文主义作为哲理基础，本文构建了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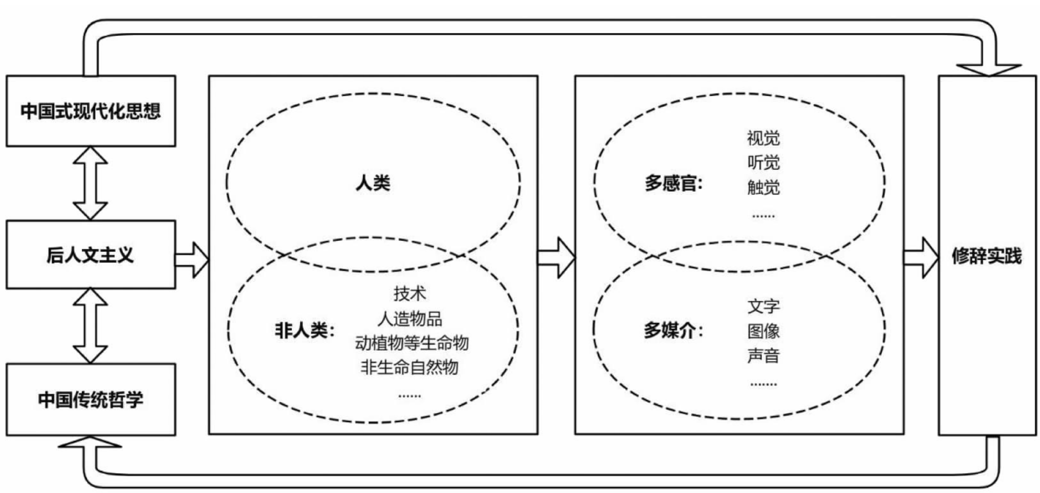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框架

如图 1 所示，在后人文主义视角下，人类与非人类元素均可借助嵌在多感官或多媒介中的符号集合，在人类—非人类要素共同构成的修辞实践集合中发挥修辞能动性。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实现对人类身体的改造或各种形式的增强，使得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重叠。同时，各种媒介形式成为修辞主体感官系统的延伸。图 1 中用虚线表示元素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并用虚线之间的交叉部分表示范畴间可能的重叠。基于该研究框架，并结合后人文主义研究关切和中国语境，本文对以下四种中国后人文主义多模态修辞学研究路径进行了展望。

(一)中国后人文主义技术修辞研究

现代技术对人的身、心、智、感等的增强、改造、

拓延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界定人的语言能力，并且语言和语言使用的概念也需要扩展到包括改变交流方式的各种技术发展。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修辞知识生产范式”的议题[17,43]。相关研究对 ChatGPT 语言生成中的修辞能力进行了探讨，但尚未涉及其图像生成中的修辞。未来研究可以探讨语言生成模型在图像甚至是音视频生产中的多模态修辞潜能。同时，国内的语言生成模型也不断涌现，具备了强大的图—文—视频生成和处理能力，然而相关的研究还较少。将其与 ChatGPT 的多模态修辞潜能进行对比，我们可以探究不同国别语言模型修辞生成在底层逻辑、意识形态和话语建构等方面的差异。此外，技术修辞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关注那些更为深入地渗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技术应用，如社交媒体中的数字美颜和 AI 换脸（作为对人类外表的数字增强）、直播带货中的切片视频和 AI 数字人（作为人化的“数据”之物），以及空间交互中的定位媒体和虚拟现实等。

总之，中国后人文技术修辞以我国国家层面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为导向，将技术看作人的身体官能的延伸，探索人—数据—语言模型集合体中各要素的互动，通过批判性研究和反思式探索，探究技术的修辞能动性，促进新质生产力更好地赋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二）中国后人文主义生态修辞研究

后人文视角下的生态修辞关注动植物等生命物以及非生命自然物的修辞能动性。该研究路径可以借鉴生命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等跨学科理论。符号修辞学已成为推动修辞学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44]。在现有关于动物能动性的研究中，崔庆明考察了野生动物旅游中云南野象能动性与景区空间能动性的匹配，探讨了这一要素在云南野象谷景区中人与亚洲象和谐/冲突关系生成的作用，并建议保护地管理应参考后人文主义理念，关注非人类行动者在构造跨物种冲突及其演变中的作用[45]。虽然该研究对动物的修辞能动性未做具体的论述，但相关发现为我们从实践层面考察动植物等生命物的修辞实践提供了启示。Rosenfeld 对 BBC 纪录片中园丁鸟布巢时展示的美学选择、文化偏好和交际目的进行研究，揭示了非人类动物进行视觉修辞的能力[18]。实际上，我国官方媒体有大量关于动植物及自然生态的呈现。如央视的《人与自然》系列节目通过跟踪记录动植物，揭示了它们如何通过特定的行为模式、信号和力量与人类进行交流和互动。这些多模态符号媒介话语为我们探讨动植物的修辞能动性、建构生态和谐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丰富的后人文素材。此外，蕴含后人文主义的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在当代文艺作品中也有广泛体现。例如，2022 年央视春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中，舞者以身体隐喻勾勒出古诗文字中描述的美丽山河；2023 年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节目《2023 重阳奇妙游》，通过登高隐喻展现出中国文化中的山岳崇拜。后人文多模态修辞研究可以把此类符号媒介作品作为素材，挖掘其中的后人文主义修辞建构的生态意蕴，以提升公众对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同时助力我国的生态有益形象建构和优秀文化对外传播。

（三）中国后人文主义情感修辞研究

后人文主义情感的典型特质是情感的物质性或环境化。作为重构后人文主体的重要环节，物与情感的激发密不可分。现有情感研究中，对物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符号景观方面，如前述 Wee 和 Goh[23] 及 Wang 和 Li[25] 的研究。中国后人文主义情感修辞研究可以从中国特色景观出发，挖掘中国红色遗迹、特色建筑、民俗舞蹈、古典乐器等多样景观载体中的情感表征，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旅游商业活动（如土家哭嫁歌和摆手舞等）中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以红色遗迹景观为例，革命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等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集体情感认同的承载者。这种情感具有强烈的具身性和物质性，探讨感受主体在具体情境中依托各种可能的资源进行的情感调动，有助于深入挖掘特定物质载体在不同语境下的修辞能动性。此外，对物的关注也可从视听载体拓展至触、嗅、味觉等感官系统。例如，各地的织造印染、编织扎制、烧制锻造、美食美味等，都蕴含着情感的物质性、符号化和时空化表达。从更广泛的感官体验中考察物所承载的情感，能够为情感修辞研究提供更加丰富和独特的视角，以深化中国文化和遗产研究。

（四）中国后人文主义政治修辞研究

去殖民主义化和去殖民性是后人文主义批评应用语言学和政治修辞的重要使命。尽管二战后殖民地相继独立，政治上的去殖民化基本完成，但殖民主义在思想、文化、学术和精神等领域的影响仍然存在

残余[46],且嵌在各种时空和物中(如殖民者留下的雕像、语言景观等)。我国的去殖民性实践一直在持续,旨在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视角质疑殖民性的思想、感受和行动。2023 年,以《逃出大英博物馆》动画为代表的“文物回家”系列作品受到公众关注,这些作品为网友自发创作,通过对人—物关系进行互喻,表达了大众强烈的文化认同和对殖民残余的抵制。此外,乌合麒麟的系列漫画作品,如《敬呼吸》《和平之师》《血棉行动》等,也反映了国人对西方中心主义、北方霸权、白人特权等政治实践的关注,并通过视觉修辞展现出对相关实践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后人文主义政治修辞研究可以积极挖掘此类媒介作品中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物—时空互融的后人文时空体(posthuman chronotope)和反霸权思想,以加深对殖民主义影响的认识。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种研究路径是基于研究现状的归纳与提炼,它们并非孤立存在的,实际研究工作中往往涉及多个路径的交织与融合。为了更加聚焦地审视或拓展传统以人类为中心的修辞研究中的特定领域,研究者可能会侧重探究后人文主义修辞中涉及的某一具体方面,从而实现对特定议题的深入剖析。同时,我们也需要不断关注该领域的最新动态,以便及时更新和完善相关研究。

五 结 语

后人文主义修辞学是修辞学研究中一种不断发展的范式,它将修辞学的研究范畴扩展到传统的人类能动性和主体性之外,认为非人类元素也能协同参与多感官或多媒介的修辞活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后人文主义的兴起是对“前”人文主义的关注、继承、反思和发展,是对西方人文哲学思想崛起并长时期主宰全球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对长期被视作“他者”或被他者化的领域和地区的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它的出现并不是要抹杀人文主义及其取得的一切成就,也不是在论证物种的等同性,而是在暗示将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科技绝对区分开来既无益也不可持续。同理,本文引入后人文主义视角,并不是否定以往国内修辞研究所作出的贡献,而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一种更广阔的视角来探索人和非人实体的修辞。此外,考虑到后人文主义诞生的西方哲学语境,本文将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中的后人文主义理念与其融通互补,尝试将该理论中国化,开辟中国后人文修辞学路径、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具体而言,结合后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关切、多模态修辞研究现状和中国语境,本文归纳出中国后人文主义技术修辞、生态修辞、情感修辞和政治修辞四种研究路径。这些路径既涵盖了宏观导向,也涉及了微观话题,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实质性参考。然而,由于篇幅有限,文中未能给出具体的案例分析,将另文探讨。

[参 考 文 献]

[1] 冯德正,张艳,王艳. 修辞结构理论在多模态语篇分析中的应用[J]. 当代修辞学,2016(5):49-58.

[2] 黄立鹤. 多模态修辞学的构建与研究——兼论修辞学与语用学的连接[J]. 当代语言学,2018(1):117-132.

[3] 顾曰国. 论言思情貌整一原则与鲜活话语研究——多模态语料库语言学方法[J]. 当代修辞学,2013(6):1-19.

[4] 顾曰国. 多模态感官系统:天官、仿人机器人、“修辞即做人”新释[J]. 当代修辞学,2019(5):48-67.

[5] Mohammadi M. Rhetoric and posthumanism[EB/OL]. (2023-12-14)[2024-10-30]. https://criticalposthumanism.net/rhetoric-and-posthumanism/.

[6] Stormer N. Articulation: a working paper on rhetoric and *taxis*[J].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2004(3): 257-284.

[7] 韩启群. 新物质主义[J]. 外国文学,2023(1):111-124.

[8] 陈子娟,徐以中.《后人文主义应用语言学》评介[J]. 现代外语,2021(1):143-147.

[9] 蒋怡. 西方学界的“后人文主义”理论探析[J]. 外国文学,2014(6):110-119+159-160.

[10] Davis D, Ballif M. 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 pushing the limits of the *anthropos*[J]. Philosophy & Rhetoric, 2014(4): 346-353.

[11] Henry J. (Re)apprai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echnical communicators from a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J].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9(1): 11-30.

[12] Lucia B, Vetter M A, Moroz O. The rhetoric of Google Lens: a postsymbolic look at locative media[J]. Rhetoric Review, 2021(1): 75-89.

[13] Brooke C G. Lingua fracta: toward a rhetoric of new media[M].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2009.

[14] Boyle C. Rhetoric as a posthuman practice[M].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5] 顾曰国. 修辞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以人机互动为例[J]. 当代修辞学,2020(6):26-50.

[16] 顾曰国,张永伟. 人生历程叙事与修辞场景元宇宙技术重构[J]. 当代修辞学,2023(6):1-13.

[17] 陆俭明. 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ChatGPT 不会影响人类的修辞知

识生产范式[J]. 当代修辞学，2024(2)：18－22.

[18] Rosenfeld C. Bowers of persuasion：toward a posthuman visual rhetoric[M]//Maiti K. Posthumanist perspectives on literary and cultural animals. Switzerland：Springer，2021：75－86.

[19] 彭佳，赵毅衡. 写在"生命符号学研究"前面的话[J]. 鄱阳湖学刊，2016(6)：41－42.

[20] Prum R O. The evolution of beauty：how Darwin's forgotten theory of mate choice shapes the animal world—and us[M]. New York：Doubleday，2017.

[21] 刘亚猛."情感转向"与西方修辞研究的自我更新[J]. 当代修辞学，2022(3)：1－18.

[22] Wee L. Situating affect in linguistic landscapes[J]. Linguistic Landscape，2016(2)：105－126.

[23] Wee L，Goh R B H. Language，space，and cultural play：theorizing affect in the semiotic landscap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

[24] Vermeulen P. Posthuman affect[J].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2014(2)：121－134.

[25] Wang J Y，Li W H. Situating affect in Chinese mediated soundscapes of suona[J]. Social Semiotics，2024(3)：489－508.

[26] Clary-Lemon J，Grant D M. Decolonial conversations in posthuman and new material rhetorics[M]. 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22.

[27] Cedillo C V. Smoke and mirrors：re-creating material relation(ship)s through Mexica story[M]//Clary-Lemon J，Grant D M. Decolonial conversations in posthuman and new material rhetorics. 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22：92－114.

[28] Wang J Y，Jin G Y，Li W H.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language in sociolinguistics[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2023(1)：1－9.

[29] Pennycook A. Translanguaging and semiotic assembla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2017(3)：269－282.

[30] Deleuze G，Guattari F.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31]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

[32] Taylor C A. Edu-crafting a cacophonous ecology：posthumanist research practices for education[M]//Taylor C A，Hughes C. Posthuman research practices in education.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6：5－24.

[33] 章可.《中国"人文主义"的概念史(1901－1932)》[J]. 史林，2016(4)：216.

[34] 王寒松. 中西人文主义精神比较[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6(3)：27－34.

[35] 刘悦笛. 后人类境遇的中国儒家应战——走向"儒家后人文主义"的启示[J]. 探索与争鸣，2017(6)：11－19＋1.

[36] Deleuze G，Guattari F. 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 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37] Chan A K. Classic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new humanities[M]//Braidotti R，Wong K Y，Chan A K. Deleuze and the humanities：east and west. 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2018：121－137.

[38] 杨丙安. 老子古本合校[M]. 杨雯，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4.

[39] 杨逢彬. 论语新注新译[M]. 陈云豪，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0] 吴志成.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华文化基础[J]. 政治学研究，2023(1)：24－33＋156.

[41] Haraway D J. 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M]//Haraway D J. 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Routledge，2013：149－181.

[42] 颜桂堤. 后人类主义、现代技术与人文科学的未来[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2)：47－54.

[43] 袁毓林. ChatGPT 等大型语言模型对语言学理论的挑战与警示[J]. 当代修辞学，2024(1)：2－17.

[44] 赵毅衡. 修辞学复兴的主要形式：符号修辞[J]. 学术月刊，2010(9)：109－115.

[45] 崔庆明. 从冲突到和谐：非人类能动性与野象谷人象关系生产[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97－106.

[46] 陈密容. 破立结合推进学术去殖民化[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16(3).